

引用格式:

罗明忠, 岳凤姣, 魏滨辉. 外出劳动力回流对农村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J]. 农业现代化研究, 2024, 45(1): 92-102.
Luo M Z, Yue F J, Wei B H. The impacts of returning migrant labors on rural income inequality[J]. Research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2024, 45(1): 92-102.
DOI: 10.13872/j.1000-0275.2023.0106



外出劳动力回流对农村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罗明忠^{1,2}, 岳凤姣¹, 魏滨辉^{1*}

(1. 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广东广州 510642; 2. 广州市新型智库重点基地乡村振兴研究中心, 广东广州 510642)

摘要: 充分释放劳动力回流的人才红利是实现农村家庭收入均衡增长的重要途径。基于相对剥夺理论, 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 (CLDS), 运用 OLS 模型, 分析劳动力回流对农村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探讨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投资在劳动力回流影响农村收入不平等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 劳动力回流比例为 21.7%, 相比于无劳动力回流的农村家庭, 有劳动力回流的农村家庭收入增加 0.362 万元, 农村收入不平等水平下降 0.09 个单位。可见, 劳动力回流能够显著缓解农村收入不平等, 且这一结论通过了多种稳健性检验。劳动力回流主要是通过增加家庭层面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投资来缓解农村收入不平等。进一步分析发现, 劳动力回流更有助于缓解工资性和财产性收入不平等, 同时这种缓解作用在中低收入、务农型和务工型农村家庭中更为明显。因此, 建议进一步加大鼓励人才回流政策宣传和资金支持力度, 搭建综合服务平台开展培训, 提升农户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

关键词: 劳动力回流; 收入不平等; 人力资本; 社会资本; 农村收入

中图分类号: F323.6; F323.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275 (2024) 01-0092-11

The impacts of returning migrant labors on rural income inequality

LUO Ming-zhong^{1,2}, YUE Feng-jiao¹, WEI Bin-hui¹

(1. College of Economic and Management,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42, China; 2. Rural Revitalization Research Centre of Guangzhou New Think Tank Key Base,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42, China)

Abstract: Releasing the potential of returning labor force talent is a key method for achieving balanced growth in rural family incomes. Based on a data drawn from the China Labor-force Dynamic Survey (CLDS) and applying the theory of relative deprivation,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impacts of labor force returning on rural income inequality by the OLS model and explored the affecting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investments in human and social capital this relationship. Results show that households with returning labor force members, comprising 21.7% of the sample, with an income increase of 3.62 thousand yuan and a reduction in income inequality by 0.09 units. The return of the labor force alleviates income inequality mainly by boosting investment in human and social capital at the household level. Further analysis reveals that this effect is more pronounced in reducing wage and property income inequality, especially in lower-income, farming, and working-type rural families. Therefore, to improve the human and social capital of rural households, this paper suggests enhancing the promotion and financial support for policies encouraging talent return and establishing comprehensive service platforms for training.

Key words: labor force return; income inequality; human capital; social capital; rural income

缩小农村内部收入差距是实现乡村振兴和全民共同富裕的关键, 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质内涵^[1]。在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双轮驱动下, 中国农村居民收入稳步提升, 生活质量明显改善, 但农村内部收入不平等的问题却在逐渐显现^[2]。国家统

计局数据显示, 中国农村居民高收入组与低收入组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比由 2013 年的 7.41 上升到 2022 年的 9.17。而农村内部收入差距过大会导致产业升级乏力、农村人力资本培育和创新投入不足, 进而拉低农村经济发展速度和效率。在此背景下, 如何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23&ZD112)。

作者简介: 罗明忠 (1969—), 男, 江西永新人, 博士, 教授, 主要从事农业经济、劳动经济研究, E-mail: luomingzhong@scau.edu.cn; 通信作者: 魏滨辉 (1995—), 男, 广东梅州人, 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农村经济研究, E-mail: weibinhui577@163.com。

收稿日期: 2023-12-01; **接受日期:** 2024-01-14

Foundation item: Major Project of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23&ZD112).

Corresponding author: WEI Bin-hui, E-mail: weibinhui577@163.com.

Received 1 December, 2023; **Accepted** 14 January, 2024

缩小农村收入不平等，激发农村发展的内生动力成为今后“三农”工作的重要任务。2021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强调乡村振兴，人才是关键，要引导城市人才下乡，推动专业人才服务乡村，吸引各类人才在乡村振兴中建功立业。据农业农村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4月，全国各类返乡入乡创业人员超过1100万，返乡入乡创业就业联农带农效果显著。可见，劳动力回流具有正外部性，有必要充分释放劳动力回流的人才红利，以求实现农村家庭收入的均衡增长和构建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3]。因此，探究劳动力回流对农村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和内在机理，对于推动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既往关于农村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因素研究主要从宏观和微观层面展开。宏观层面主要集中于经济增长、城乡二元结构、相关政策制度安排等。其中，有关农业政策研究较为深入。Rozelle^[4]发现鼓励农民进行农业生产的政策有助于缩小农民收入差距。之后，有学者利用各国数据证实了农业保险对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重要作用^[5-6]。微观层面主要关注个体的婚姻状况、学历水平、家庭成员数量、年龄结构等个人和家庭因素^[7]。此外，也有学者关注地区地理条件、自然资源禀赋、物质资本差异和人力资本差异等因素对农村收入不平等的影响^[8-10]。

近些年，在城乡之间推拉合力作用下，农村劳动力转移呈现出明显的“钟摆”式特征，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11-12]。具体看，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和城市居高不下的生活成本，农村进城务工劳动力的心理认同和归属感往往较弱，长此以往，将导致他们在城市定居的意愿消退。加之一系列助农惠农政策的激励，当前农村制度环境明显改善，发展机遇浮现，就近就业前景和态势不断明朗，越来越多农村外出务工人员选择回乡择业。回流劳动力作为既了解农业生产结构和区域布局，又承载着现代化生产技术和经验的重要群体，是畅通城乡要素合理流动、促进资源有效配置的新动能和新支柱。部分学者已经验证了劳动力转移在农村居民拓收、减贫等方面的重要贡献^[13-14]。

综上，已有文献为本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支撑和经验指导，但有关劳动力回流对农村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的研究较为缺乏。事实上，劳动力作为极为活跃和最具有能动性的生产要素，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往往发挥着关键性作用。考虑到先天禀赋和地理位置等因素，要减缓农村收入不平

等和减轻高收入群体对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剥夺，不仅依赖于国家政策对农村发展的支持，更关键的是提高农村劳动力的自我发展能力和发展资本。农业农村部发布数据显示，一个返乡创新创业项目平均可吸纳6.3人稳定就业、17.3人灵活就业。回流劳动力有助于带动农民实现就近就业创业，提升农村低收入群体收入，或能成为缓解中国农村人力资本不足、带动农民增收致富、缩小农村收入差距的关键性力量。为此，本文基于相对剥夺视角，利用2016—2018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采用OLS模型实证分析劳动力回流对农村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探讨农村家庭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投资在劳动力回流对农村收入不平等影响中的作用机制，从微观层面捕捉农村家庭收入不平等状况。同时，采用分组回归方法，从收入水平、收入来源、职业类型视角考察劳动力回流对农村收入不平等的异质性影响，以期为改善农村收入分配和助力全民共同富裕提供参考借鉴。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1 劳动力回流对农村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关于收入不平等，高位收入差距是表征，低收入群体自我发展能力相对缺乏是其内核^[15]。农村居民发展能力的高低，决定了其配置资源、利用资源和提高生产力的能力强弱。一般而言，相较于留守劳动力，回流劳动力得益于习得技能、外出阅历的积累，眼界有所拓宽、见识有所增长，更易在引导农民致富、培育“三农”发展新动能、助推乡村振兴等方面发挥作用。已有研究表明，在城市集聚效应影响下，入城劳动力不仅获得了物质财富，还在观察和学习的过程中，提升了自身素养，获得了先进生产管理经验和人力资本的积累^[16]。这种积累可以内化为相对优势，使劳动力在回乡从事非农活动时，具备获得较高工资溢价的可能。此外，在农业生产方面，回流劳动力通过合理调配资源，采用节水灌溉、节肥技术，将大大缩减农业生产要素成本^[17]。不仅如此，回流劳动力以较强的就业创业能力引导其他农户转移到非农产业、现代农业，有助于通过有效整合资源，实现土地要素适度流转和规模化经营，进而助推农村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增加农村低收入群体的经营收益和财产收入^[18]。更为重要的是，劳动力要素作为富有自主性、能动性的生产要素，其跨区域自由流动有助于知识的传递和扩散，进而促使不同区域经济实现包容性发展^[19-20]。

一方面，伴随着劳动力回流，资金、信息、技

术等资源向农村汇聚,实现了以人才为载体的资源和资本下乡。物质财富积累、思维与观念革新、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的深化,有助于优化调整劳动力、资金、土地等资源配置格局,从而为农村剩余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和非农创业活动提供稳定的资金支持,保障农户生计可持续^[21]。同时,劳动力回流还有助于拓宽社会网络,突破以亲缘、血缘和地缘为主的关系网络。农村居民得以更广泛地互通往来、相互协作,其资源整合能力和信息获取能力将得到明显提升,进而帮助农户及时调整经营管理策略,降低经营风险^[22]。另一方面,无论是在思想观念上,还是在信息获取和技术运用层面,进城务工经历都使回流劳动力具备了职业化、专业化、市场化等明显优势。因而,回流劳动力可以通过深入挖掘地方资源,因地制宜发展旅游业和服务业等富民产业,稳步推动农村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和地方特色产业体系的构建,实现农村产业融合与产业链发展,充分释放乡村价值。这不仅有助于盘活农村闲置资产,还能开拓多样化的就业岗位,进而保障低收入群体就近稳岗就业^[23]。在这种情况下,农村低收入群体获得签订劳动合同、职位晋升和绩效提升的机会增加,农村劳动力整体供给质量有所改善,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村收入相对剥夺程度。

总体看,劳动力回流实现了人才下乡、资源下乡和资本集聚,有助于释放农村特色产业新动能和改善农村发展环境,进而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和农村收入分配格局,保障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持续增长。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劳动力回流对农村收入不平等具有负向抑制作用。

1.2 人力资本投资的中介作用

尽管劳动力回流使得农村信息和技术更为可及,但最终,这些资源能否真正为农村居民所用,并转化为生产力的提高,还取决于农村居民资源要素配置能力的高低。事实上,劳动力迁移,作为一种人力资本投资形式,不仅使回流劳动力实现了个体层面物质财富的积累、思想观念的更新,还促进了家庭层面人力资本投资决策的转变^[24]。外出就业劳动力回流后,会更多地基于家庭效用最大化的考量,增加必要投入,运用新技术、信息、资金等要素,促进家庭资源的合理配置,实现家庭人力资本保值与增值。例如,回流劳动力往往会主动增加家庭教育和医疗保健方面的资金投入,以此改善健康状况、保障劳动收入、培育家庭稳步发展的内生动力,拓展家庭人力资本的增值空间。

一方面,外出务工丰富了回流劳动力相关阅历,

回流劳动力具备了更为长远的投资视野,也逐渐意识到教育的基础性和先导性作用。由此,回流劳动力将更加重视子女或自身教育水平,加大对代际教育、参与继续教育和参加职业技能培训的投资。一般而言,教育投资力度越大,农民搜寻市场信息和把握市场机遇能力越强,也就能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发展空间,进而缩小机会不平等。而且,教育投资能够提高认知水平和人力资本积累,丰富知识储备,打破技术壁垒,从而补齐低收入群体就业短板,提高物质资本边际回报率,产生规模报酬递增效应^[25]。故而,增加教育投资,有力保障农村居民运用信息和技术能力的持续提升,是有效降低收入不平等的重要路径。

另一方面,伴随着劳动力回流,“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瘥后防复”的健康理念也随之引入,有助于改变农村以往“有病再医、小病拖,大病扛”的传统观念。农村家庭将更加重视健康要素,愿意主动增加营养保健支出、医疗保险资金投入,以此保障身体健康,避免因劳动力能力下降而陷入贫困^[26]。具体看,身体越健康的农民,家庭医疗支出较少、生产力也相对较高,在生产活动中往往也可获得更高的劳动报酬。另外,身体素质越高的农民愈有动力在生产阶段增加储蓄,增加对子女教育的投资,进而降低了贫困代际传递的可能性。故而,增加家庭人力资本投资,提升资源配置的能力,是劳动力回流缓解农村家庭收入剥夺的有效路径。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劳动力回流会通过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来缓解农村收入不平等。

1.3 社会资本投资的中介作用

劳动力回流不仅转变了农村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决策,也影响着其社会资本投资理念。进城务工、经商和求学等经历使得回流劳动力在良好的社会互动和社会交往过程中,更加明晰建立与维系信任机制、互惠合作关系的重要性^[27]。尽管社会资本投资带来的收益可能在短期内并不明显,但劳动力回乡发展,无论是就业还是创业,在一定程度上都需要借助由亲缘或地缘展开的关系网络力量,以此保持长期良好互信的关系,拓宽生存发展空间。因此,相较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回流劳动力会采取更加主动的行为,增加相应人情往来支出,用以寻找资金信息资源、拓宽就业渠道或识别创业机遇,例如,主动与商业伙伴加强信息沟通合作交流,共享信息资金和技术,亦或是主动与周围农户、亲人朋友密切往来,建立人际信任开展互惠活动,构建更深层的关系网络。总体看,基于长远目标的考虑,回流

劳动力在日常生产生活中，会主动与身边农户交流互动，并更愿意投入前期积累的部分资源，用以构建和维护稳定的社会关系网络。

社会资本作为嵌入市场机制中的可持续性关系网络，不仅会影响回流劳动力家庭的生计行为，也会对农村其他家庭的就业选择和收入分配产生深远影响^[28]。一方面，回流劳动力通过有效整合资金信息资源，增加家庭社会资本投资，有助于构建更高质量、更深层次的关系网络。农村其他家庭借助共同认可、熟悉的社会网络和组织关系，可以获得资金、信息和人脉支持，拓展信息来源渠道，缓解信息不对称性，减少搜寻、整合碎片化与非结构化信息的成本，进而获得更多就业选择机会，增强自身发展能力^[29]。另一方面，其他农村家庭能够从稳定的社会关系网络中获得风险保障和非正式社会支持，如信贷支持，由此改善农村就业结构、强化农民合作意识，缓解由流动性约束过大带来的收入差距^[30]。综上，劳动力回流增加社会资本投资，有助于帮助农村其他农户弥补信息不对称、节省交易成本，提升个体素质，进而更好地匹配就业需求，为更多农民拓宽收入渠道创造条件，以此缩小农村收入差距。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劳动力回流会通过增加社会资本投资来缓解农村收入不平等。

2 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2016—2018年的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hina Labor-force Dynamic Survey, CLDS)。该调查采用多阶段、多层次与劳动力规模成比例的概率抽样方法，在全国29个省(区、市)开展，主要调查对象为15~65岁的劳动人口。问卷内容包含了详细的劳动力回流信息、农村家庭收入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相关问题^[19]，满足了本文研究劳动力回流对农村收入不平等影响的需求。为方便测算，本文对数据作如下处理：一是合并个体、家庭、村庄层面数据；二是保留农村户籍的个体；三是剔除调查数据中存在缺失值、异常值的个体。最终本文得到有效样本为13 742个。

2.2 变量选取

1) 被解释变量。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农村收入不平等。借助有关学者研究，基于相对剥夺视角，利用Kakwani指数来测度农村收入不平等^[31-32]。具体测算方法为：

$$KAI_i = \frac{1}{n\mu_Y} \sum_{j=j+1}^n (y_j - y_i) = \varphi \frac{v - y_i}{\mu_Y} \quad (1)$$

式中：KAI代表农村收入不平等水平； y_i 和 y_j 分别表示将 n 组农村家庭收入从低到高排序后，第 i 个和第 j 个家庭的年收入； Y 表示任意一个群组， μ_Y 表示 Y 中样本收入均值； v 表示 Y 中收入超过 y_i 的其他样本的收入均值； φ 表示群组 Y 中收入超过 y_i 的样本数量占总样本数量的百分比。

2) 核心解释变量。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是外出劳动力回流状况。既往研究认为农村回流劳动力需满足农村户籍、曾经外出务工并在接受调查时已经回到农村的特征。因而，本文将满足农村户籍、曾在户籍地以外居住或工作过半年及以上、且在调查年份已经返回到农村三个方面条件的受访农户，判定为处于回流状态，赋值为1；其余情况代表未回流，赋值为0。

3) 机制变量。本文的机制变量是人力资本投资和社会资本投资。参考王云多和马玉洁^[33]的研究，通过教育和医疗保健两个方面的总支出衡量人力资本投资。社会资本投资则采用家庭对非家庭成员支出的礼金总额进行度量^[34]。需要说明的是，由于部分家庭的医疗保健、教育和礼金支出存在0值，故参考已有研究，对两个变量的数据加1后再进行对数化处理。

4) 控制变量。为尽可能缓解遗漏变量带来的估计结果偏误，本文选取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和村庄特征作为控制变量。其中，个体特征包括年龄、性别、婚姻状况、身体状况和教育水平；家庭特征包括家庭规模、家庭15岁以下孩子占比、65岁以上老人占比、有无家用车辆和家庭负债情况；村庄特征包括村庄地形和村庄产业。此外，还控制了年份固定效应和省份固定效应。

各变量的定义与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1。

2.3 模型设定

运用OLS模型估计劳动力回流对农村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具体模型设定为：

$$KAI_{it} = \alpha_0 + \alpha_1 RETU_{it} + \alpha_2 X_{it} + \varepsilon_{it} + \gamma_t + \eta \quad (2)$$

式中：KAI_{it}为被解释变量，表示农村家庭 i 在 t 时期的收入不平等水平，KAI_{it}越大表明收入不平等程度越高；RETU_{it}为本文核心解释变量，取值为1表示属于回流劳动者，取值为0表示非回流劳动者， X_{it} 表示一系列影响收入不平等的控制变量，包括个体、家庭、村庄等层面的变量， α_0 为常数项， α_1 、 α_2 为待估参数， ε_{it} 为随机扰动项， γ_t 为年份固定效应， η 为省份固定效应。

表 1 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
Table 1 Variable definitions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变量类别	变量名称	定义	均值	标准差
被解释变量	农村收入不平等	通过 Kakwani 指数计算所得	0.518	0.292
核心解释变量	劳动力回流	回流 =1 ; 未回流 =0	0.217	0.412
控制变量	年龄	实际年龄 (岁)	46.454	14.425
	性别	男 =1 ; 女 =0	0.475	0.499
	婚姻状况	已婚 =1 ; 未婚 =0	0.826	0.379
	健康状况	自评身体健康 : 用 1~5 分赋值	3.566	1.032
	教育水平	受教育年限 (年)	7.537	3.920
	家庭规模	家庭成员数量 (人)	2.176	1.037
	少儿抚养比	家庭 15 岁以下孩子占家庭人口比例 (%)	0.074	0.232
	老年抚养比	家庭 65 岁以上老人占家庭人口比例 (%)	0.014	0.079
	家用车辆	有家用车辆 =1 ; 无 =0	0.227	0.419
	家庭负债	有 =1 ; 无 =0	0.350	0.477
	村庄地势	平原 =1 ; 山地和丘陵 =0	0.519	0.500
	村庄产业	有 =1 ; 无 =0	0.255	0.436
机制变量	人力资本投资	教育和医疗保健总支出 (元), 取对数	8.085	2.900
	社会资本投资	礼金支出 (元), 取对数	4.413	1.727

注 : 表中赋值变量的分值越大, 表明程度越高。

2.4 倾向得分匹配检验

在分析劳动力回流对农村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时, 还需要考虑到自选择问题。这是因为农户是否选择回流会受到个人、家庭和村居条件的影响, 这种“自选择”行为可能会导致有偏估计。因此, 本文拟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法 (PSM) 来纠正自选择带来的选择偏差和有偏估计。为保证结果稳健, 本文采用近邻匹配、半径匹配、核匹配三种匹配方法进行估计。

2.5 稳健性检验

为进一步保证估计结果的稳健可靠, 本文采用三种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其一, 更换被解释变量测度方式。借鉴以往学者的研究, 采用 Yitzhaki 指数来测度农村收入不平等状况^[35]。其二, 变更估计模型。采用再中心化影响函数 RIF 回归。具体而言, 分别以农村家庭收入的 90~10 分位距、基尼系数作为被解释变量, 多层次考察估计结果, 验证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其三, 剔除特殊样本。由于直辖市的经济相对其他省级行政区要发达一些, 农户样本相对较少, 因此本文将样本中四个直辖市样本 (北京、上海、天津和重庆) 剔除之后再次进行回归。

3 结果与分析

3.1 劳动力回流与农村收入不平等分析

统计结果显示, 农村劳动力回流比例为 21.7% (表 1), 总体上, 劳动力回流比例还处于较低水平。可能的原因在于被调查年份中国城市和农村之间的

收入差距仍然显著; 同时, 城市的服务业、建筑业和高级制造业能为外出劳动力提供更加多元的就业机会和更好的职业发展前景, 而农村地区的工作机会相对有限, 多为农业或小规模制造业。因此, 尽管部分农村外出劳动力选择了回流, 但大多数还是会基于多种考虑而选择留在城市。

运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分析有劳动力回流与没有劳动力回流农户各类收入的均值差异。结果表明, 没有劳动力回流农户的家庭总收入、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均值分别为 4.547 万元、2.091 万元和 0.490 万元, 有劳动力回流农户的家庭总收入、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均值分别增加 0.362 万元、0.549 万元和 0.055 万元 (表 2), 且均值差异在统计意义上显著。而未回流农户的财产性收入比回流农户增加 0.015 万元, 但均值差异并不显著。可能的原因在于农村地区的财产性收入通常较低, 且主要来源于租金、利息和股息等。而这些收入来源与劳动力的直接关联不大, 所以即使有劳动力回流, 财产性收入也不太可能因为劳动力回流产生显著变化。此外, 未回流农户的转移性收入上升 0.227 万元, 与回流农户转移性收入的均值差异显著。可能的原因在于农村家庭劳动力回流往往会影响家庭获取政府补贴的资格。特别是在中国, 一些社会福利和补贴与城市户籍或在城市的就业状态挂钩, 这可能会导致回流家庭的转移性收入显著减少。最后, 回流农村家庭的收入不平等水平下降 0.09 个单位, 与未回流农户的均值差异显著, 这与前文的理论分

表 2 相关变量不同分组的均值比较
Table 2 Comparison of the means of different groupings of related variables

变量名称	无劳动力回流的农户		有劳动力回流的农户		均值差异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农村家庭收入 (万元)	4.547	0.062	4.908	0.126	-0.362***
工资性收入 (万元)	2.091	0.033	2.640	0.087	-0.549***
经营性收入 (万元)	0.490	0.032	0.544	0.054	-0.055***
财产性收入 (万元)	0.060	0.092	0.045	0.080	0.015
转移性收入 (万元)	1.906	0.044	1.679	0.079	0.227***
收入不平等	0.547	0.003	0.457	0.005	0.090***

注：表中均值差异均为无劳动力回流的农户与有劳动力回流农户的差值，***、**和*分别表示 T 检验在 1%、5% 和 10% 的水平下显著。

析相符。

总体来看，劳动力回流能够显著提升农户收入水平，尤其是工资性和经营性收入。更为重要的是，劳动力回流可以显著缓解农户收入不平等。但由于个体特征、家庭特征、村庄特征等因素也会影响农户收入，导致相关统计指标的差异可能不是劳动力回流带来的必然结果，故需要进行进一步的实证分析检验。

3.2 劳动力回流对农村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分析

估计结果显示，劳动力回流对农村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始终为负，在控制年份效应和省份效应，依次加入个体特征、家庭特征、村庄特征一系列变量后，最终影响系数为 -0.044，通过了 1% 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表 3），说明劳动力回流有助于降低农村收入不平等水平。就控制变量而言，年龄和老人抚

养比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随着年龄的增大，家庭养老负担加重，农村收入不平等有增大趋势。教育水平的提升能够显著降低农村收入不平等水平，可能的原因是，农民学历水平和文化素养提高，其能运用和吸收的新技术和新理念也就越丰富，收入也会随之增加。自身健康状况越佳，在医疗方面支出较少，也越有利于缓解收入不平等状况。此外，家庭负债越少也能抑制农村收入不平等。就村庄地势和村庄产业发展两个方面看，村庄属于平原地势，能够更加方便地开展生产活动；村庄产业的发展壮大可以为农民发展提供良好环境和资源，这些都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农村收入不平等。

3.3 劳动力回流对农村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作用机制分析

根据理论分析，劳动力回流可能通过增加人力

表 3 劳动力回流对农村收入不平等影响的估计结果
Table 3 Estimation results of the impacts of labor return on rural income inequality

变量名称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劳动力回流	-0.110***	0.006	-0.037***	0.006	-0.041***	0.006	-0.044***	0.006
年龄			0.005***	0.001	0.004***	0.001	0.004***	0.001
性别			-0.118***	0.005	-0.120***	0.005	-0.122***	0.005
婚姻状况			-0.108***	0.008	-0.094***	0.008	-0.095***	0.008
健康状况			-0.033***	0.002	-0.031***	0.002	-0.029***	0.002
教育水平			-0.009***	0.001	-0.008***	0.001	-0.007***	0.001
家庭规模					0.005**	0.002	0.006**	0.002
老人抚养比					0.080***	0.009	0.080***	0.009
少儿抚养比					-0.064	0.046	-0.069	0.046
家用车辆					0.027***	0.005	0.023***	0.005
家庭负债					-0.058***	0.006	-0.054***	0.006
村庄地势							-0.047***	0.005
村庄产业							-0.027***	0.006
常数项	0.347***	0.029	0.492***	0.036	0.522***	0.036	0.554***	0.037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13 742		13 742		13 742		13 742	
R ²	0.051		0.188		0.201		0.206	

注：***、**和*分别表示 1%、5% 和 10% 的显著性水平，标准误为稳健标准误；上述样本量有所减少，是因为删减了缺失值，下同。

资本投资和社会资本投资,来缓解农村收入不平等。故本文通过逐步回归法来检验上述作用机制。

人力资本投资的机制检验结果显示,劳动力回流对农村收入不平等的回归系数为负,并在 1% 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表 4),说明劳动力回流能够降低农村收入不平等水平。同时,劳动力回流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回归系数在 1%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且系数符号为正,表明随着劳动力回流,家庭会增加教育和医疗保健的投资。在基准回归模型中加入人力资本投资变量后,劳动力回流和人力资本投资变量对农村收入不平等的的影响均在 1% 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负,表明人力资本投资的机制作用显著,即劳动力回流不仅直接影响农村收入不平等状况,而且会通过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来缓解农村收入不平等。总体看,劳动力回流使得家庭增加了在教育、医疗保健方面的资金投入,进而通过人力资本的扩张效应、平等化效应来缩小农村收入差距。

社会资本投资的机制检验结果显示,劳动力回流对社会资本投资具有正向影响,且通过了 1% 的显著性检验(表 4),表明劳动力回流有助于增加社会资本投资。将社会资本投资加入基准回归模型后,其回归系数和劳动力回流系数均显著为负,这说明社会资本投资在劳动力回流影响农村收入不平等的

效应中发挥机制作用。换言之,增加社会资本投资,确实是劳动力回流缓解农村收入不平等的作用机制之一。

3.4 倾向得分匹配检验分析

本文通过平衡性检验和共同支撑检验结果来验证倾向得分匹配的可靠性(表 5)。采用多种方式匹配之后, Pseudo R^2 显著下降到 0.001~0.002; 均值偏差下降到 1.4%~2.6%; 中位数偏差下降至 1.4%~2.8%。可见,本文的处理组和控制组的各匹配变量不存在显著的系统性差异,并且大部分的样本都在共同支撑域中。由此得知,在倾向得分匹配过程中样本的损失量小,匹配效果较好。

经过倾向得分匹配法重新估计,得到劳动力回流对农村收入不平等影响的平均处理效应(ATT)。由结果可知,不论采用一对一近邻匹配、一对三近邻匹配、半径匹配或是核匹配法进行估计,所得结果基本一致,即劳动力回流降低了农村收入不平等水平,且在 1% 统计水平上显著(表 6)。在考虑了农户选择性偏差后,相比于非回流农户来说,回流农户的收入不平等水平会下降 0.030~0.039 个单位,上述结果再次验证了本文结论的可靠性。

3.5 稳健性检验分析

稳健性估计结果显示,在更换被解释变量测

表 4 机制检验结果
Table 4 Mechanism test results

变量名称	农村收入不平等		人力资本投资		农村收入不平等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劳动力回流	-0.044***	0.006	0.169***	0.053	-0.045***	0.006
人力资本投资					-0.003***	0.001
常数项	0.554***	0.037	7.409***	0.397	0.464	0.577***
样本量	13 742		13 742		13 742	
R^2	0.206		0.077		0.202	
变量名称	农村收入不平等		社会资本投资		农村收入不平等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劳动力回流	-0.044***	0.006	0.156***	0.065	-0.048***	0.006
社会资本投资					-0.004***	0.001
常数项	0.554***	0.037	4.172***	0.464	0.429***	0.036
样本量	13 742		13 742		13 742	
R^2	0.206		0.069		0.197	

注:上述回归中的控制变量、年份固定效应、省份固定效应均已控制,下同。

表 5 联合性样本检验
Table 5 Joint sample test

匹配方法	Pseudo R^2	LR 值	P 值	均值偏差 (%)	中位数偏差 (%)
匹配前	0.084	1 218.820	<0.001	19.0	15.8
一对一近邻匹配	0.002	19.580	0.075	2.6	2.8
一对三近邻匹配	0.001	4.320	0.977	1.4	1.4
半径匹配	0.002	16.590	0.166	2.5	2.4
核匹配	0.002	19.580	0.075	2.6	2.8

表 6 倾向得分匹配 (PSM) 法的处理效应
Table 6 Treatment effect of the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PSM) method

匹配方法	处理组	控制组	ATT	标准误	T 值
一对一近邻匹配	0.584	0.612	-0.030***	0.008	-3.85
一对三近邻匹配	0.457	0.493	-0.036***	0.007	-5.01
半径匹配	0.457	0.500	-0.038***	0.006	-5.94
核匹配	0.457	0.497	-0.039***	0.006	-6.23

度方式之后，劳动力回流对农村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仍显著为负，并通过 1% 的显著性检验（表 7）；同时，将农村家庭收入的 90~10 分位距和基尼系数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劳动力回流的回归系数为 -0.321 和 -0.047，分别在 5% 和 1% 统计水平上显著。此外，排除直辖市样本后重新进行估计，劳动力回流的回归系数为 -0.045，并在 1%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与基准回归结果非常接近。综上，劳动力回流能抑制农村收入不平等，且这一结论相对稳健。

3.6 异质性分析

1) 基于收入的异质性分析。上文已经验证了劳动力回流能够有效缓解农村收入不平等。为进一步考察劳动力回流对不同收入层次农村家庭影响的异质性，本文选取了 4 个代表性分位点，利用分位数回归模型来展开分析^[36]。回归结果显示，劳动力回流对中低收入群体的作用较大，而对较高收入群体的影响较小（表 8），表明劳动力回流更能促进中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增长，进而缩小与高收入农村家庭间的差距，以此缓解农村收入不平等，这与基准回归的分析结果保持一致。

2) 基于不同类型收入的异质性分析。为进一步了解劳动力回流缓解农村收入不平等的成因，本文分别考察劳动力回流对不同类型农村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结果显示，以工资性收入不平等为被解释

变量进行回归，劳动力回流变量系数为负，且通过 1% 显著性检验（表 9），表明劳动力回流缓解了工资性收入不平等。而劳动力回流缓解农户经营性收入不平等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对于财产性收入不平等而言，劳动力回流变量系数为负，且通过 5% 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劳动力回流也有助于缩小财产性收入不平等。综上，劳动力回流主要是通过缩小农村家庭工资性和财产性收入不平等来缓解农村收入不平等。究其原因，一方面，伴随着劳动力回流，多种资源和资本也流入农村，农村产业得到发展，因而低收入农户能够实现就近就业，获得工资性收入，由此缩小农村家庭工资性收入不平等。另一方面，劳动力回流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农村家庭人地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土地流转，有助于实现规模化经营和增加低收入农户财产性收入。由此，劳动力回流也在缓解财产性收入不平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3) 基于职业类型的异质性分析。不同职业类型的农户，劳动力回流对其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也可能存在差异。在 CLDS 问卷中，被访者职业被划为雇员、雇主、自雇和务农四种类型。本文借鉴靳欣婷和孟志兴^[37]的研究，将自雇型和雇主型视为创业型农户，并最终将总样本划分为务农型、务工型和创业型农户。回归结果显示，劳动力回流对务农

表 7 稳健性检验结果
Table 7 Robustness test results

变量名称	Yitzhaki 指数		90~10 分位距		基尼系数		Kakwani 指数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劳动力回流	-0.135***	0.040	-0.321**	0.131	-0.047***	0.017	-0.045***	0.006
常数项	1.059***	0.145	6.194***	0.642	0.477***	0.068	0.641***	0.024
样本量	13 742		13 742		13 742		13 582	
R ²	0.174		0.035		0.008		0.208	

表 8 收入的异质性结果
Table 8 Test result of the heterogeneity of income

变量名称	Q25		Q50		Q75		Q90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劳动力回流	0.188***	0.048	0.211***	0.026	0.147***	0.020	0.113***	0.028
常数项	8.566***	0.213	9.349***	0.151	10.017***	0.182	10.420***	0.238
样本量	13 742		13 742		13 742		13 742	
R ²	0.123		0.153		0.126		0.065	

表 9 不同类型收入和职业的异质性分析结果
Table 9 Analysis results of the heterogeneity across different types of income and occupation

变量名称	工资性收入不平等		经营性收入不平等		财产性收入不平等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劳动力回流	-0.047***	0.007	-0.005	0.004	-0.012**	0.005
常数项	0.786***	0.042	1.075***	0.018	0.924***	0.045
样本量	9 333		9 333		9 333	
R ²	0.117		0.058		0.063	
变量名称	务农型农户收入不平等		务工型农户收入不平等		创业型农户收入不平等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劳动力回流	-0.023**	0.008	-0.057***	0.010	-0.010	0.018
常数项	0.434***	0.149	0.695***	0.050	-0.431	0.137
样本量	9 293		3 234		1 211	
R ²	0.162		0.152		0.172	

型和务工型农户的收入不平等影响显著，而对创业型农户的收入不平等影响并不显著（表 9）。对此可能的解释是，劳动力回流改变了原有的人地匹配关系，有助于优化农地资源配置，实现农业规模化经营，同时，回流劳动力在外务工积累了相关的生产经验，也使其回乡之后更容易寻找到相应的工作岗位。对于创业型农户来说，其收入不仅取决于自身素养，还受市场价格、气候变化和政府政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而劳动力回流可能对这些因素的影响较为有限。同时，现代农业和相关产业发展越来越依赖技术和效率的提升，而不仅仅是劳动力数量。因此，即使有较多劳动力回流，如果没有技术和管理能力的相应提升，创业型农户收入不平等也可能不会有显著变化。除此之外，相比于务农型和务工型农户，创业型农户本身就有着较高水平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积累，获得了多元的收入渠道，因而劳动力回流通过增加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投资，对创业型农户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往往并不明显。

4 结论与启示

4.1 结论

研究表明，回流农村家庭收入均值明显高于未回流农村家庭收入均值，有回流劳动力的农村家庭收入不平等水平相对较低，劳动力回流对农村收入不平等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一方面，劳动力回流使得多种资源要素向农村聚集，有助于发展现代农业，减少农业生产成本，提升农户农业生产效率和效益。另一方面，劳动力回流使得农户具备就近就业和创业的条件，回流劳动力利用在外务工经验，给予农村剩余劳动力相关技术和经验指导，相互共享资源和广泛开展信息交流合作，进而帮助低收入群体拓

宽收入来源，以此缓解农村收入不平等。

作用机制分析表明，劳动力回流使得家庭层面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投资增加，农户通过合理配置家庭资源，构建农村居民共同认可的社会网络，共享资金和信息资源，强化农民合作意识，进而激发农村发展内生动力，保障农村家庭收入的可持续和缩小农村家庭之间的收入差距。此外，劳动力回流对农村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劳动力回流对农村收入不平等的缓解效应，更能体现在工资性和财产性收入不平等上。因此，可以考虑借助回流劳动力在信息资源资金方面的优势，发挥回流劳动力辐射带动效应，助力农村其他农户实现更高水平的发展，进而赋予农村发展新活力，缓解农村收入不平等。

本文从相对剥夺视角研究农村收入不平等，揭示劳动力回流对农村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机理，有助于丰富既有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也为缓解农村收入不平等提供了政策建议。需要说明的是，劳动力迁移涉及因素较多、历程也较长，但限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仅使用 2016—2018 年的数据研究劳动力回流对农村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机理，后续需要利用更为详细的数据进行进一步分析，不断拓宽研究内容。

4.2 启示

1) 进一步加大鼓励人才回流政策宣传和资金支持力度，合理引导农村劳动力回流至乡。劳动力要素畅通流动，是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有力支撑，也是实现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一方面，应进一步构建更为完善的政策体系引导劳动力回流，疏通劳动力“城—乡”流动的渠道，加强政策宣传，让在外务工群体了解农村发展的政策红利，力求通过多种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回流劳动力助推乡村振兴的

积极性。另一方面，加大对回流群体回乡发展的扶持力度，改善农村教育、医疗等基础公共服务，为回流劳动力营造良好的生产和生活发展环境，让农村不仅能吸引人才，还能留得住人才。积极鼓励回流劳动力参与乡村建设，既要立足实现自身发展，又要为农村其他农户提供发展机会，引导低收入群体收入稳步增长，为实现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2) 搭建综合服务平台开展培训，增加培育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物力人力投入。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提升不仅有助于提升农村家庭收入和农业生产效率，而且有利于改善农村经济发展模式，进而保障农民收入的可持续和均衡发展。因此，应不断完善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加强农民在线教育培训，通过设立返乡入乡“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积极打造覆盖县、乡、村的服务网络，促进合作创新。同时，应充分发挥回流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优势，引导回流劳动力与农村剩余劳动力建立信息共享平台，开展良好社会互动，进而造就一批能够引领一方、带动一片的农村实用人才。

致谢：特别感谢中山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库的支持。

参考文献：

- [1] 尹含, 孙伯驰. 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J]. 林业经济, 2023, 45(7): 40-59.
Yin H, Sun B C. Study on the impact of digital village construction on the income gap of rural residents[J]. Forestry Economics, 2023, 45(7): 40-59.
- [2] 陈明华, 张边秀, 张腾文, 等. 中国农村民生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状况、机制及对策[J]. 农业经济问题, 2023(3): 34-50.
Chen M H, Zhang B X, Zhang T W, et al. The unbalanced and inadequate situation, mechanism and countermeasures of China rural people's livelihood[J]. Issues in Agricultural Economy, 2023(3): 34-50.
- [3] 魏滨辉, 罗明忠, 曾春影. 劳动力返乡创业与县域产业结构升级: 理论线索与经验证据[J]. 中国农村经济, 2023(10): 26-48.
Wei B H, Luo M Z, Zeng C Y. Returning laborers' entrepreneurship and county-level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Theoretical insights and empirical evidence[J]. Chinese Rural Economy, 2023(10): 26-48.
- [4] Rozelle S. Rural industrialization and increasing inequality: Emerging patterns in China's reforming economy[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1994, 19(3): 362-391.
- [5] Goodwin B K. Problems with market insurance in agriculture[J].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2001, 83(3): 643-649.
- [6] Mosley P, Krishnamurthy R. Can crop insurance work? The case of India[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1995, 31(3): 428-450.
- [7] 孙敬水. 农村居民收入不平等形成机理研究综述[J]. 云南财经大学学报, 2013, 29(4): 87-92.
Sun J S. Research review on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rural residents' income inequality[J]. Journal of Yunna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2013, 29(4): 87-92.
- [8] Bowyer T. Public space, inequality and health: Interaction and social welfare in rural Peru[J].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05, 19(4): 475-492.
- [9] Ranjan R. How socio-economic and natural resource inequality impedes entrepreneurial ventures of farmers in rural India[J]. European Journal of the Development Research, 2019, 31(3): 433-460.
- [10] 吴本健, 牛林漪, 罗献晓. 数字普惠金融推进民族地区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理论机制、现实挑战与优化路径[J]. 农村金融研究, 2023(8): 3-14.
Wu B J, Niu L Y, Luo X X.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promotes common prosperity of farmers and rural areas in ethnic region: Theoretical mechanism, practical challenges and optimization path[J]. Rural Finance Research, 2023(8): 3-14.
- [11] 罗明忠. 农村劳动力转移后回流的原因: 逻辑推演与实证检验[J]. 经济学动态, 2008(1): 51-54.
Luo M Z. Reasons for rural labour return after transfer: Logical extrapolation and empirical tests[J].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08(1): 51-54.
- [12] 李芳华, 姬晨阳. 乡村振兴视角下的农村劳动力回流弹性估计——基于空间断点回归的研究[J]. 中国农村经济, 2022(2): 36-55.
Li F H, Ji C Y. Estimation of return elasticity of rural labor for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Evidence based on spatial discontinuity design[J]. Chinese Rural Economy, 2022(2): 36-55.
- [13] 牛坤在, 许恒周. 农地赋权与农村内部收入不平等——基于农地流转与劳动力转移的中介作用[J]. 中国土地科学, 2022, 36(3): 51-61.
Niu K Z, Xu H Z. Farmland empowerment and rural internal income inequality: Based on the intermediary role of farmland transfer and labor transfer[J]. China Land Science, 2022, 36(3): 51-61.
- [14] 耿晋梅, 赵璇. 初次分配下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原因: 分析与述评[J]. 经济问题, 2018(6): 26-30.
Geng J M, Zhao X. The causes of residents income inequality in the primary distribution: Analysis and review[J]. On Economic Problems, 2018(6): 26-30.
- [15] Herault N. Explaining the equalising effect of panel-income changes[J]. The B.E. Journal of Economic Analysis & Policy, 2016, 16(3): 1599-1609.
- [16] Combes P P, Duranton G, Gobillon L. The productivity advantages of large cities: Distinguishing agglomeration from firm selection[J]. Econometrica, 2012, 80(6): 2543-2594.
- [17] 陈宏伟, 穆月英. 劳动力转移、技术选择与农户收入不平等[J]. 财经科学, 2020(8): 106-117.
Chen H W, Mu Y Y. Labor transfer,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adoption and farmers' income inequality[J]. Finance & Economics, 2020(8): 106-117.
- [18] 张凤兵, 王会宗. 劳动力返乡、要素配置和农业生产率[J].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20(3): 73-84.
Zhang F B, Wang H Z. Migrant workers return, factor allocation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J]. Journal of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21, 20(3): 73-84.

- [19] 罗明忠, 陈晓杰, 魏滨辉. 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对农民幸福感的影响[J]. 农业现代化研究, 2023, 44(3): 398-409.
Luo M Z, Chen X J, Wei B H. The impacts of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on farmers' happiness[J]. Research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2023, 44(3): 398-409.
- [20] 蔡昉. 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基于一个贯通的增长理论框架[J]. 经济研究, 2013, 48(11): 4-16, 55.
Cai F. Understanding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Based on a unified framework of growth theories[J].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2013, 48(11): 4-16, 55.
- [21] 罗明忠, 魏滨辉. 返乡创业、产业升级与农民收入增长[J].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23(1): 83-96.
Luo M Z, Wei B H. Back-to-home entrepreneurship,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farmers' income growth[J]. Journal of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2023(1): 83-96.
- [22] 陈哲, 李晓静, 夏显力. 外出务工经历、动态能力对电商创业绩效的影响[J]. 经济经纬, 2021, 38(6): 42-52.
Chen Z, Li X J, Xia X L. The influence of migrant work experience and dynamic ability on e-commerce entrepreneurship performance[J]. Economic Survey, 2021, 38(6): 42-52.
- [23] 贺小丹, 董敏凯, 周亚虹.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民工回流与农村资源配置——基于农民工返乡后行为的微观分析[J]. 财经研究, 2021, 47(2): 19-33.
He X D, Dong M K, Zhou Y H. Return migration and resource allocation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Based on the micro-level analysis of return migrants' behavior[J]. Journal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2021, 47(2): 19-33.
- [24] Galor O, Stark O. Migrants' savings, the probability of return migration and migrants' performance[J].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1990, 31(2): 463-467.
- [25] 袁冬梅, 金京, 魏后凯. 人力资本积累如何提高农业转移人口的收入?——基于农业转移人口收入相对剥夺的视角[J]. 中国软科学, 2021(11): 45-56.
Yuan D M, Jin J, Wei H K. How does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improve the income of agricultural transfer population? Based on the relative deprivation of income of agricultural transfer population[J]. China Soft Science, 2021(11): 45-56.
- [26] 金双华, 于洁, 田人合. 中国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促进受益公平吗?——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实证分析[J]. 经济学(季刊), 2020, 19(4): 1291-1314.
Jin S H, Yu J, Tian R H. Does China's basic medical insurance system promote benefit equity?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J]. China Economic Quarterly, 2020, 19(4): 1291-1314.
- [27] 张梁梁, 李世强. 社会资本与乡村善治: 基于“三治融合”的视角[J]. 城市发展研究, 2021, 28(11): 98-103.
Zhang L L, Li S Q. Social capital and good governance in rural area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three governance integration”[J]. Urban Development Studies, 2021, 28(11): 98-103.
- [28] 邓大松, 杨晶, 孙飞. 收入流动、社会资本与农村居民收入不平等——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证据[J].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73(3): 103-114.
Deng D S, Yang J, Sun F. Income mobility, social capital and farmers' income inequality: Evidence from CFPS[J]. Wuhan University Journal (Philosophy & Social Science), 2020, 73(3): 103-114.
- [29] 杨柠泽, 王艺蔚, 孙学涛. 数字素养与农户共同富裕: 影响效应及其机制[J]. 广东财经大学学报, 2023, 38(6): 21-32.
Yang N Z, Wang Y W, Sun X T. Digital literacy and farmers' common prosperity: Effects and mechanisms[J]. Journal of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2023, 38(6): 21-32.
- [30] 郭露, 刘梨进. 金融科技、收入不平等与多维相对贫困脆弱性[J]. 财经科学, 2023(3): 15-29.
Guo L, Liu L J. Fintech, income inequality, and vulnerability to multidimensional relative poverty[J]. Finance & Economics, 2023(3): 15-29.
- [31] Kakwani N. The relative deprivation curve and its applications[J]. Journal of Business & Economic Statistics, 1984, 2(4): 384-394.
- [32] 罗明忠, 魏滨辉. 乡村治理、社会资本与农村收入差距[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40(6): 116-136.
Luo M Z, Wei B H. Rural governance, social capital and rural income disparity[J]. Journal of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2023, 40(6): 116-136.
- [33] 王云多, 马玉洁. 区域经济视角下人力资本对物质资本投资抑制效应研究[J]. 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44(3): 18-25.
Wang Y D, Ma Y J. The investment inhibition of human capital to physical capita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gional economy[J]. Journal of 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ocial Sciences), 2023, 44(3): 18-25.
- [34] 胡金焱, 张博. 社会网络、民间融资与家庭创业——基于中国城乡差异的实证分析[J]. 金融研究, 2014(10): 148-163.
Hu J Y, Zhang B. Social network, informal financing and household entrepreneurship: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urban-rural differences in China[J]. Journal of Financial Research, 2014(10): 148-163.
- [35] 斯丽娟, 汤晓晓.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研究——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J]. 经济评论, 2022(5): 100-116.
Si L J, Tang X X. The impact of 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 on farmer's income inequality: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CFPS data[J]. Economic Review, 2022(5): 100-116.
- [36] 杨丹, 王晓丽, 唐羽. 农业补贴、农户增收与收入不平等[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5): 60-70, 171.
Yang D, Wang X L, Tang Y. Agricultural subsidies, rural income increase and income inequality[J]. Journal of 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20(5): 60-70, 171.
- [37] 靳欣婷, 孟志兴. 农业补贴对农村家庭创业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实证分析[J]. 世界农业, 2022(1): 112-123.
Jin X T, Meng Z X. Study on the influence of agricultural subsidies on rural family entrepreneurship: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 in China[J]. World Agriculture, 2022(1): 112-123.